

## 10-14 杜威十进分类法对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影响

## ——纪念杜威十进分类法出版120周年

白国应

G254.12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北京 100080)

《杜威十进分类法》简称DDC,自1876年以来,已先后出版了20版,到现在已整整120周年了。这部图书分类法体系严谨、结构完整、技术先进、讲究实用、修订及时、使用广泛、影响深远<sup>[1]</sup>。它开辟了图书分类法的新纪元,成为图书分类法历史上的里程碑。

据考证<sup>[2]</sup>,《杜威十进分类法》于1910年由孙毓修首先在《教育杂志》上介绍,此后我国学者就不断地对它进行翻译、研究、评论、教学、使用和借鉴,对我国图书分类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将其影响的几个方面阐述如下。

## 1 对图书分类法思想的影响

我国图书分类法源远流长,在古代曾出现了《七略》和《四部》,但都受封建统治阶级、儒家思想、古代学术源流和历代书目分类的影响很大。19世纪中叶,随着帝国主义势力的侵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思想、近代科学和技术也流传到我国来。反映新思想、新学科、新技术的图书数量剧增,极大地冲击了《四部》法的分类体系,这就为《杜威十进分类法》的输入开辟了市场。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影响下,我国图书分类学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

1.1 以学科内容性质为图书分类的主要标准。如刘国钧认为:“图书分类的目的便是要将性质相同的图书集中在一起,以求用时之便利。”又说:“图书分类原为供研究学术而作,故宜以学科分类(即论理的分别为准),但因书籍实质上之特点不能处处合于论理,故不得不稍加变通,而参以体裁的分别。至于地理、时代、语言等分类标准亦酌用之。”<sup>[3]</sup>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图书分类以学科内容性质为主要标准,以形式体裁为辅助标准。

1.2 以科学分类为基础。如刘国钧说:“盖四库以体裁为主,学科为副。”当今的分类法则“反其道而行之”。他在编制《中国图书分类法》时,其分类体系,不是在“四部”之部类的基础上进行增减,而是仿照《杜威十进分类法》,采用了近代的科学分类体系。又如杜定友说:“类例主要在于部居群籍以便世守,世守之书不以一时一地之限,故类例门目以学术为经,以书籍为纬,书可佚而学不可或亡,故类例之法必在书而独立,详列群书,以待群书。”<sup>[4]</sup>意思就是说图书分类必须以科学分类为基础,结合图书特点来类分图书。

1.3 讲究实际效用。如皮宗石说:“杜威十进分类法,原其法以十进部次群籍,应用之便,诚非他书可企及也。虽说‘杜法’为西书而设,初非兼中籍而并筹省;且也,类目陈旧错列,繁省失均,经以总贯中西载籍,其穷屈不适用,比夫七略四库,一何以异?事非更张,理涉探索,仿杜补杜,固有不然,至若仿杜,而独以附偏模,率尔就简,亦未见其可也。盖我国之学术,自有其特性,不容偏废苟简。世之作者,必悉加纂录、详制类目,使适中外文籍,庶云有济。”<sup>[5]</sup>从这段叙述里可以看出,编者编制《中国十进分类法》是力求结合中国的实际,达到方便应用。

1.4 分类要详细。如刘国钧说:“分类以详为贵,而昔人多略。详则便于专攻,略则流于笼统。近世学术,侧重专门,故西方图书分类亦主精详。中土学风,素尊賅博。故图书类部,常厌烦琐。窥测将来之学术界,则分工研究殆为不二之途,是以本分类克宁取琐细。此又本表之不同于前人者也。”<sup>[4]</sup>杜定友也主张“分类宜详论”<sup>[6]</sup>。这些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过去图书分类较粗而言的,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但是对我国新型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有指导意义。所以不论是解放前编制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简称《刘法》)、《世界图书分类法》(简称《杜法》)、《中国十进分类法》(简称《皮法》),或者是解放后编制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

分类法》(简称《人大法》)、《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类目都比较详细。如《皮法》设有类目1万多个,《中图法》设有类目3万多个。

1.5 注意运用先进的编制技术方法。《杜威十进分类法》有一套比较先进的编制技术方法,它不但满足组织分类目录的需要,而且适应近代图书馆图书排架、流通的要求。所以从沈祖荣、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等老一辈图书分类学家,到解放后成长的一批图书分类学者,都主张注意运用先进的编制技术方法,从而摆脱了我国近两千年来寓于书目的图书分类法,形成了独立成册有标记符号等先进技术作为图书分类工具的“新型图书分类法”系统<sup>[1]</sup>,开创了我国图书分类法的新纪元。

## 2 对图书分类法体系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许多新的图书馆纷纷建立,新的科学图书也大量出现。图书馆原来使用的图书分类法,已不适应需要,因此许多图书分类学家纷纷向外国图书分类法学习。其中最突出的是向《杜威十进分类法》学习,于是,所谓“仿杜”、“改杜”、“补杜”的图书分类法先后出现,据统计大致有30多种。比较著名的有:沈祖荣、胡天生的《仿杜威十类分类法》(1917年);杜定友的《世界图书分类法》(1922年发表,1925年改编为《图书分类法》,1935年改名为《杜氏图书分类法》);洪有丰的《图书分类法》(1924年);查修的《杜威书目十类法补编》(1924年);王云五的《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1928年);刘国钧的《中国图书分类法》(1929年);安徽省立图书馆的《图书分类法》(1929年);陈子彝的《图书分类法》(1929年);何日章、袁涌进的《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1934年);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法》(1934年);桂质柏的《分类大全》(1935年);裘开明的《汉和图书分类法》(1937年)等。它们的分类体系,大都仿照《杜威十进分类法》,就是说,把全部图书分为十大部,每大部分分为十大类,每大类分为十中类,每中类分为十小类,依次类推下去。不过每一类中的第一类都属总类,因此实际上按学科内容分类的只有九类。现将《杜威十进分类法》十大部和我国“五四运动”前后各家图书分类法的大纲列表对照如下:

家别	号码	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900
杜威	总类	哲学	宗教	社会科学	语言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美术	文学	史地	
沈祖荣	经部及类书	哲学宗教	社会与教育	政治经济	医学	科学	工艺	美术	文学及语言学	历史	
杜定友	总类	哲学科学	教育科学	社会科学	艺术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语文	文学	史地	
洪有丰	丛	经	史地	哲学宗教	文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艺术		
查修	经部	哲学	宗教	社会科学	语言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美术	文学	史地	
王云五	总类	哲学	宗教	社会科学	语言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美术	文学	史地	
刘国钧	总部	哲学	宗教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社会科学	史地	史地	语文	美术	
安徽省立图书馆	总类	哲学	宗教	社会科学	语文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艺术	地理	历史	
陈子彝	丛	经	史地	哲学宗教	文学	教育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艺术	
何日章	总部	哲学	宗教	社会科学	语言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美术	文学	史地	
皮高品	总类	哲学	宗教	社会科学	语言	自然科学	实业工艺	美术	文学	历史	
桂质柏	总类	经	史地	哲学宗教	文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应用科学	艺术	革命文库	
裘开明	经学	哲学宗教	史地	史地	社会科学	语文	美术	自然科学	农林工艺	丛书目录	

由于《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分类体系以近代科学分类为基础,符合当时科学发展的水平,使得我国图书分类体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步取代了封建社会的“四部”分类体系。但是由于“十进”的限制,也对当时这些图书分类法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甚至影响到解放初期编制的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和山东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等。它们的分类体系都囿于十大类之中。只有到《人大法》、《中小型表》、《科图法》、《大型法》、

《中图法》，才能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依据，以现代科学分类为基础，完全冲破“十进制”的束缚。如《人大法》分为17大类<sup>[9]</sup>，《科图法》分为25大类<sup>[10]</sup>，《中图法》分为22大类<sup>[11]</sup>。不过，在二、三级以下的类目体系中，还是受《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影响。例如《科图法》的自然科学大部的细分与《杜威十进分类法》的“500 自然科学”和“600 应用科学”的细分就有很多相似之处：

《科图法》		《杜威十进分类法》	
50	自然科学	500	自然科学
51	数学	510	数学
52	力学	520	天文学
53	物理学	530	物理学
54	化学	540	化学
55	天文学	550	地球科学
56	地球科学	570	生命科学
58	生物科学	600	应用科学
61	医药卫生	610	医学科学
65	农业科学	620	工程学
71	工业技术	630	农业

又如《中图法》“语言、文字”的分类体系也是和《杜威十进分类法》一样，对于一些常用语言采取了“优先排列”的原则：

《中图法》		《杜威十进分类法》	
H	语言、文字	400	语言
0	语言学	410	语言学
1	汉语	420	英语及盎格鲁撒克逊语
2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	430	日尔曼语族、德语
3	常用外国语	440	罗马语族、法语
31	英语	450	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
32	法语	460	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
33	德语	470	意大利语种、拉丁语
34	西班牙语	480	古希腊语、古典希腊语
35	俄语	490	其他语言
36	日语		
37	阿拉伯语		
4	汉藏语系		

### 3 对图书分类法体制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图书分类法是以书目的组织形式出现的，分类体系隐含在书目中，没有单独的类目表，没有类目标记符号，更没有单独成册的图书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类目按等级层层展开并详细列举。它能使各种类目按相关性排列成一个具有从属、并列关系的秩序井然的类目等级体系，给人以“鸟瞰全貌”、“触类旁通”的感觉，同时用阿拉数字标记类目，分类表独立印行，创造了完整的等级列举式体制。这种体制，不仅影响了我国解放前编制出版的图书分类法，也影响了我国解放后编制出版的图书分类法。1917年，沈祖荣、胡庆生首先以《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体制为榜样编制《仿杜威书目十类法》。现在看来，虽然简略，但它却是我国近代第一部为中文图书而编的新型分类法。说它“新”，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1）第一个脱离了目录体系而独立成为类分所有文献的分类工具<sup>[7]</sup>；（2）全部类目按等级列举式组织；（3）首次采用阿拉伯数字来标记类目。以后陆续编辑出版的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等都是沿用《杜威十进分类法》的体制的。

解放后，我国编制的《人大法》、《中小型法》、《科图法》、《大型法》和《中图法》，虽然说仍旧是采用等

级列举制,但已在此基础上更加完善。如在类目体系上,多数类目以图书的内容属性为主要类目划分标准,以图书的形式属性为辅助标准,在类目划分上,一般应遵守下列规则:①每次划分只能使用一个标准;②由一个类划分出来的各个类应互相排斥;③所列出来的各个类的外延之和要等于其上位类的外延。在类目关系上,分清了从属关系、并列关系、交叉关系和同一关系。在类目级别上,则分别称为一级类、二级类、三级类、四级类,等等。《科图法》和《中图法》为了体现等级列举式,还利用了行格的进退和字体的大小来表示。即每个下位类都依次向后退一格,采用较小一号的字体。同位类的行格和字体则完全一样。这样,上位类、下位类、同位类,关系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 4 对图书分类法结构的影响

《杜威十进分类法》1876年出版时,取名为《图书馆图书、小册子排架及编目适用分类法和主题索引》,1885年第二版时,设置形式复分表,改名为《十进分类法及相关索引》。1994年第5版时,首次出版供中小型图书馆使用的简本(类目数量约为详本的10%)。1951年第15版时,改名为《杜威十进分类法》。1965年第17版时,增设地区复分表。1971年第18版时,增设文学、语言、人物、语种、种族等5个通用复分表。1979年第19版时,首次出版《DDC使用手册》。1989年第20版时,共出4卷,结构更完整了,包括主表、附表、索引和使用手册。另外还继续出版简本。它的结构形式对我国图书分类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从主表来看,无论是《杜法》、《刘法》、《皮法》,或者是《人大法》、《科图法》、《中图法》,都仿照了DDC,分别设置了大纲(大类)、简表和详表。

从附表来看,DDC设置了:①标准复分表;②地区复分表;③文学复分表;④语言复分表;⑤人种、种族、民族复分表;⑥语种复分表;⑦人物复分表。我国各种图书分类法也仿照DDC设置了各种用途不同的附表。例如《中图法》设置了:①总论复分表;②世界地区表;③中国地区表;④国际时代表;⑤中国时代表;⑥中国民族表。

从索引来看,DDC有一个很详细的相关主题索引。它是由各式各样主题的名称以及它们的同义词、新旧词等按字母顺序排成的一览表。索引的每条标目后面,均注明相应的分类号。既详细又系统,对分类标引人员和读者都有很大的帮助。凡遇某种图书资料一时不知在何处时,只须检查索引,即得相关号码,运用极称方便。所以我国图书分类法纷纷仿效。例如《科图法》第一、第二版和《中图法》第二版都仿照DDC的方法编制了相关索引。

从使用手册来看,DDC从1934年起就编制有《关于十进分类法使用法的说明和决定》,1961年,编制出版了《DC使用方法指导书》<sup>[8]</sup>,1979年在上述的基础上正式出版了《DDC使用手册》,对广大图书分类标引人员使用DDC具有指导作用。我国解放前出版的图书分类法,一般只在前言(或导言)中简单介绍使用方法,到了解放后,大家就比较注意撰写使用方法了。特别是《中图法》编委会,先后编制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使用说明》(1981年)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第三版使用手册》(1991年)。

从版本来看,DCC除了出版《简本》以外,还于第20版时出版了电子版(亦称电子杜威)。我国《中图法》编委会为了照顾各类型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单位分类图书和资料的需要,已先后出版“详本”:《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简本”:《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本》,“期刊本”:《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期刊分类表》,“儿童版”:《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儿童图书馆、中小学图书馆版)》,“分类主题一体化版”:《中国分类主题词表》。将来也准备出版电子版。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 5 对图书分类法标记符号的影响

《杜威十进分类法》的标记符号简单、明了、易懂,从而为图书排架、目录组织提供了简便易行的基础。因此我国近代和现代图书分类法都纷纷仿效。

5.1 从分类号码的成份来看。《杜法》、《刘法》、《皮法》、《人大法》和《科图法》等都如同DDC一样,采用单纯的阿拉伯数字来标记全部类目,《杜法》、《刘法》和《皮法》等还像DDC一样,首先采用阿拉伯数字1到9来分别表示九个大类,而以0来表示总论类。每类进一步划分时也是按照这原则在原有号码后加上一个数字表示划分出来的下位类。

5.2 从分类号码的编制方式来看。我国近代和现代的图书分类法都像DDC那样,采用了等级制。只不过是具体运用方法有所不同。《科图法》主要是在两位数字00—99以后加一个小数点,然后采用等级制。《中图法》则是在字母后用数字表示等级制。但它们为了使号码适应类目的需要,对于超过十个同位类时,采用

了“扩九法”(1、2、3、4、5、6、7、8、91、92、93...)。同时,为了缩短号码和充分利用号码,采用了“借号法”。此外,为了使号码清楚醒目,易于辨认,《中图法》在分类号码的三位数字之后,隔以小圆点。

5.3 从分类号码的助记性来看。我国各部图书分类法都像DDC一样,采用了助记原则。同一概念用同一的数字表示。如《科图法》,1总是理论,04总是历史,中国总是2,亚洲总是4,日本总是43,美国总是563,等等。又如《中图法》,1总是理论,—09总是历史,中国总是2,亚洲总是3,日本总是313,美国总是712等等。这对分类人员组织号码大有帮助。

5.4 从“0”的使用方法来看。《科图法》借鉴并扩展了DDC关于“0”的使用方法。除了用“0”作为“总类复分表”复分符号和作为变换分类标准的标记符号以外,还用“0”作为五大部的标记符号,即00表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0表示哲学;20表示社会科学;50表示自然科学;90表示集合性图书。其他分类法也大都像DDC一样,第一,“0”代表一个类的整体,第二,“0”作为变换分类标准的标记。只有《中图法》有所特殊,它不是用“0”表示“总论复分表”的复分符号,而改用“—”表示。但仍然使用“0”表示分类标准的转换。

## 6 对图书分类法修订工作的影响

《杜威十进分类法》前后修订过20次,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无论是经验或教训都对我国图书分类法的修订工作产生重大影响。

6.1 从组织机构来看。DDC由于有美国国会图书馆、DDC编辑方针委员会及森林出版社(现改为OCLC)三者组成实力雄厚的管理机构,5—6年修订一次,使DDC不断更新,这对我国图书分类法修订工作来说,是十分宝贵的经验。但解放前,我国的图书分类法由于都是个人编制,很少有能力进行修订,除了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由北京图书馆修订过以外,绝大多数都由于未修订而被停止采用。解放后出版的图书分类法也只有《人大法》、《科图法》和《中图法》有常设组织机构保证,才不断地进行修订。所以说,设立组织机构是修订图书分类法的有力保证。

6.2 从修订原则来看。DDC120年来遵照“要跟上新知识发展的步伐”和“要照顾号码的完整性和等级制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这两条原则,对我国图书分类法修订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因此,无论是《人大法》、《科图法》,或者是《中图法》,每一次修订,都增补大量有关新学科、新技术、新事物、新问题的类目,使图书分类法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同时也照顾到相对稳定,可动可不动的不动,非动不可的则将删去类目的号码予以保留,以便某些单位仍可以继续使用。

6.3 从修订方法来看。在图书分类法的修订过程中,常常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大改、大删、大增、大动;一种主张小改、小删、小增、小动。《杜威十进分类法》就遇到这种情况,它在14版之前,基本上是采取小改的主张。但在1951年出版第15版时,根据美国凯利(G. Kelley)等一批图书馆学家“简化分类”的主张,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办法,删去了2.5万多个类目,只剩下4621个类目,引起了广大使用单位的强烈不满,逼得《杜威十进分类法》连忙推出15版修订版,恢复了很多类目,才把大家的不满平息下来。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所以《科图法》、《中图法》、《人大法》在修订中都吸取了这个教训,基本上都是采取小改的方法,因此修订时主要是调整、充实和提高,逐步达到完善。

总的说来,DDC对我国图书分类法的思想、体系、体制、结构、标记符号和修订工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使我国图书分类法在理论上或技术上均有了较大的发展。最近,据《北京高校图书馆学刊》报导,DDC第21版将在年内出版。相信它的问世将同样对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和提高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 参考文献

- 1 白国应.历史上的丰碑.山西图书馆学报,1996,(3)
- 2 李 严.为杜威法首次传入我国质疑.江苏图书馆工作,1980,(3)
- 3 刘国钧.中国图书分类法.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1936
- 4 杜定友.世界图书分类法.上海:上海图书馆协会,1935
- 5 皮高品.中国十进分类法.武昌:文华公书林,1939
- 6 尹恺德,宋传山等.中国图书分类学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7 刘延章.文献分类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 8 刘国钧.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 9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五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 10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修订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 11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三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